

乡土嵌合： 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面向与行动路径

□ 易艳阳

[摘要] 农村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成。城市化现代化专业化属性的社会工作进入农村的本土化实践,遵循乡土嵌合的基本逻辑,其具有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关联对象的多元性、互动关系的协同性、介入情境的复杂性、功能效用的整合性之特征。政治维度的党政体系、社会维度的资源系统、情感维度的缘情网络、文化维度的乡风民情与需求维度的美好生活,形塑当代中国农村的乡土新情境,并构成本土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实践面向。农村社会工作需以专业性、协同性、柔性化、敏感性与精准化为导向,探索政治嵌合、资源嵌合、缘情嵌合、文化嵌合、需求嵌合的多维嵌合行动路径对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农村社会工作;乡土嵌合;乡土性;嵌入性;农村公共服务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8.014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24)08-0130-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残疾人家庭内生动力培育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21BSH12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江苏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生态与韧性建设研究”(2023SJZD080)。

作者简介: 易艳阳(1983—),女,管理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引言

2021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要培育社会工作人才,搭建社会工作和乡村建设志愿服务平台。2021年4月,《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发布,强调将社会工作与基层民政建设紧密结合,加快建立健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制度体系,力争实现“十四五”期末的乡镇(街道)、村(社区)社会工作全覆盖的目标。2023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提出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发展已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构成。社会工作具有天然的助人自助与扎根服务属性,农村社会工作的高质量本土化实践,是供给乡村公共服务、保障百姓民生福祉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农村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以村庄为地域基础,以全体农村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农村弱势群体为服务重点,协同多元资源,发挥专业优势,参

与乡村服务供给与基层治理,有效满足农村各类人群的美好生活需求,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专业化实践。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城市化现代化属性的专业社会工作,如何适应乡土性传统性的中国农村环境场域,有效供给社会服务,参与社区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同时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功能与价值,是我国社会工作学界的焦点议题之一。综观关于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研究成果,归纳而言有三类视角:第一类是资源视角,即围绕社会工作介入的资源基础与资源再生产,分析农村社会工作可依托的乡村固有社会资本^①或者社会基础^②,以进行资源再生产,实现服务资源与服务需求之间的耦合^③,探索资产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路径^④。第二类是关系视角,即分析农村社会工作在具体实践中与其他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社会工作以及作为社会工作服务载体的农村社工机构、乡镇社工站等通过嵌入获得发展空间^⑤,有效发挥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中的协同作用^⑥。第三类是功能视角,即主要探究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立足点或干预焦点以实现其价值功能,比如农村

社会工作应关注家的回归与赋权^⑦,推动“以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⑧,介入农村新贫困治理^⑨等问题,以强化其社会保护机制^⑩的本质价值功能。由此,正视社会工作相对于中国农村的“水土不服”,探索契合中国乡村性^⑪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与行动路径,建构综合不同取向与策略的包容性的农村社会工作体系^⑫,以开展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探索,构建本土化的实务模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城乡二元背景下,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着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不足、留守群体生活发展困境、相对贫困治理等共通性问题;但由于自然生态、历史变迁、经济条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别,我国农村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社会工作在具体介入时,可能面临相异的实践场域,从而产生不同的介入效果。现有研究或从宏观视角探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共同困境或发展导向,或基于某地区的实践案例分析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或基本经验。如何进一步关注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普遍共通性与区域异质性,结合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与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凝练

①王思斌:《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中社会资本的协作再生产》,《社会工作》2021年第4期。

②王思斌:《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东岳论丛》2022年第1期。

③石伟、王学梦:《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资源—需求”的分析框架》,《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

④万江红:《资产如何为本——兼论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求索》2021年第2期。

⑤张洋勇:《嵌入、服务与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实践过程——以福建省DC村项目为例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工作研究》2019年第1期。

⑥陈涛、胡沙、杨欣然:《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乡村治理中的协同作用——基于Y农村社工事务所在Z村的经验分析》,《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期。

⑦焦若水:《家的复归与赋权:农村社会工作整合发展的文化基础》,《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⑧金昱彤:《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流动性冲击与家为核心的发展路径》,《探索》2022年第3期。

⑨高飞:《后扶贫时代的新贫困治理:社会工作的定位与角色——一个长程的比较视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⑩焦若水:《社会保护:乡村振兴中社会工作的价值与使命》,《探索》2021年第6期。

⑪吴越菲:《重思以乡村性为基点的农村社会工作:概念嬗变与实践转型》,《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⑫郭伟和:《构建包容性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体系——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介入策略探索》,《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1期。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综融通用取向的实践理念与行动路径,以适应不同农村复杂的服务环境,应对不同农村的治理与服务需求,提升社会工作的介入效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从嵌入到乡土嵌合: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①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与学术概念已被广泛接纳。嵌入原指一个物体进入/植入另一物体,并产生紧密的关系。波兰尼以“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阐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②,市场嵌入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格拉诺维特从经济社会学视角提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意味着一种社会性孤立^③,个体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④。在我国固有的“国家—社会”情境下,专业社会工作在嵌入传统行政性非专业化的本土社会工作(比如民政工作)的实践中逐渐获得自主性成长空间,并致力于向协同性发展、融合性发展^⑤方向转型。鉴于社会工作的现代化城市化特质以及社会工作发展的城乡不平衡性,社会工作进入乡土则更多表现为一种“外来者”身份,由此,嵌入性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但是,单纯的嵌入语境更多突出嵌入主体(专业社会工作)与嵌入客体(行政化主体)之间的关系,且尚未呈现出社会工作与其实践场域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联动。由此,在嵌入视角基础上,综合协同合作、整合融合等理念,嵌入演进为嵌合;同时关注中国农村的特定乡土特性,切合不

同区域农村的乡土性的差别性呈现,乡土嵌合则可能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嵌合”意指嵌入并结合,其概念起初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指物体之间的相嵌性结合。比如,工程学中的“钉铆结合”,物理学研究中的“共轭”,遗传学中的“不同遗传性状的混杂”,信息学中的“不同信息的糅合”等,均具有嵌合之含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嵌合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嵌入或互嵌之后,结合成新的嵌合体,能较好地合作、协同、整合和一体化行动的现象^⑥。由此,嵌入、相互结合、功能整合等构成了嵌合的基本内涵,嵌合是嵌入概念的发展与延伸,具有相互嵌套、协调整合的意蕴。乡土嵌合是指专业社会工作相对于中国农村乡土性的嵌入与整合。乡土并非单一的地域概念,是多要素汇聚关联的集合体。农村社会工作进入农村社区,与乡土中的诸多要素对接、相嵌并结合构成乡村社会服务整合功能体。

乡土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三重要点,即乡土性、嵌入性与整合性。乡土性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实践出发点;嵌入性是作为乡村外源型资源的农村社会工作扎根发展并保证其专业性之必由路径;整合性是农村社会工作有效开展的必要策略,也是其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重要目标。基于乡土嵌合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框架的基本特征为:一是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农村社会工作作为实践主体,不应仅被动吸纳进入乡村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中。社会工作应充分发挥其固有的资源禀赋,积极作为,因地制宜,拓展个性化的服务项目与个别化的服务内容,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成长为能动性的治理主体。二是关联对象

①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②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3页。

③马克·格拉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④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⑤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从嵌入性发展到融合性发展之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⑥王思斌:《社会工作参与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专业功能的嵌合性实现——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为基础》,《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6期。

的多元性。农村社会工作不仅是在地理空间上进入乡村,其与乡村场域中的多元要素,包括组织体系、服务对象、资源结构、社会文化等连接互动,构成多维嵌合。三是互动关系的协同性。农村社会工作不仅是专业社工服务拓展至乡村,且需与乡土中诸多治理主体与资源要素搭建平等协作、合作共享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提升服务效能,同时吸取资源,获得成长力量,扎根乡土而发展。四是介入情境的复杂性。农村社会工作需与农村整体性复合性的乡土场域相嵌并结合,考虑不同农村社区的复杂治理情境,关注“三留守”人群服务等中国农村共通的社会治理议题,同时需结合具体农村社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与社会结构,施行个别化精准化的介入。五是功能效用的整合性。作为农村“外来户”的社会工作与乡村固有的内生性资源相结合,对接乡村社区的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需求,整合行政管理、专业服务、乡民自治、社区互助等功能,以期实现美好生活、民生福祉、治理有效等多重效用,构筑乡村基层服务共同体。

三、新乡土情境: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面向

西方社会工作源于应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贫困、流浪、失业等社会问题的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似乎有其固有的城市基因。但“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①,服务乡土中国,是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的必然使命。在我国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史中,由知识分子所主导的类社会工作实践,譬如近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等,在我国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史中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愚、贫、病、私”之类的问题视角的认知,使得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实践难以避免落入“他者”视角的窠臼。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学科得以重建与发展,但是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存在着显著的地域与城乡不均衡,社会工作主要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探索实践;农村社会工作则相对滞后,常表现为个别地区与高校学者合作开展的农村社工实验项目。农村社会工作常以城市中心主义视角审视农村,即

假定农村相对于城市是落后的,比如个人素质与资源不足、社区公共设施缺乏、社会观念传统愚昧、公共服务供给缺失等。基于城市的“他者”立场,农村社会工作常表现为问题视角的介入,即通过社会工作干预,以应对解决贫困、留守、乡风文明、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围绕乡村社会问题进行干预、提升村民素质、改造乡村社区、弥合城乡差距,是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面向。这类实践取向带有专业威权主义色彩,可能脱嵌于农村乡土性,而蕴含水木不服、专业失灵风险。由此,需基于去城市中心主义视角,基于发展的视角精准认识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的新乡土情境,以实现社会工作与乡村实践场域多重要素的有机嵌合。

费孝通眼中的传统中国乡土性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非流动性以及熟人社会三方面。现代化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带来剧变,但在城乡二元背景下,我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资源结构等仍与城市存在巨大差别,农村的乡土性并未消逝而是发生了形态转型。当代中国的村庄作为实体依然存在并延续,然而其乡土性已逐渐变迁。比如,单一型农业生产转型为三产融合等多元产业格局,农民生计从传统的农耕型向半工半耕模式转变。农村流动性频繁,人口外流严重,少数农村地区也呈现出人口回流、人口流入等逆流动趋向。合村并组扩大了农村社区的空间与规模,村民之间的熟悉度与交往度降低。由此,当代中国的农村乡土性呈现出农业+副业、流动性^②以及半熟人社会^③的新形态。资源下乡、服务下沉、空巢社会、流动社会等新乡土情境,拓展了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也构成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实践面向。基于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关联方来识别农村的新乡土情境,重点可从政治、社会、情感、文化以及需求五个维度来考察。

其一,政治维度的党政体系。党政体系主要指向以乡村基层党组织与行政化组织为载体的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②陆益龙:《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人文杂志》2016年第11期。

③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民生保障,以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纾民困、解民忧、惠民生,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民生导向的治理目标拓展了服务属性的社会工作的广阔政策空间与实践舞台;民政部门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要求,更是直接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全面落地实践。由此,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全范围规模化发展可以说是党政全力推进的成果。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与政府购买服务等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赋予农村社会工作身份合法性与行动合法性,构成农村社会工作的政治基础,也彰显出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国家在场”。在我国农村基层实践中,部分地区通过乡镇“党政服务综合体”^①夯实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在村级治理层面,村党支部作为社区党组织实质上是国家权力贯穿基层的重要载体。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职业化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纯洁性^②。在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村委会实质上承担着基层政府的行政职能延伸的功能。部分地区探索村级“党政同构”^③,以党政“一肩挑”模式破解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困境,致力将党的领导权威与治理优势有效融入乡村治理体系。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实现党政社联动,是我国农村基层“善治”目标,也是政治维度的新乡土情境的呈现。新时代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引领,党政联动,协同推进乡村各项事业发展,构成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政策基础与持续动力。

其二,社会维度的资源系统。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所关联的资源系统主要指向除党和政府之国家力量以外的乡村社会内部所固有的社会化支持资源及其互动关系。社会工作的重要功能即资源整合,源于乡村内部的支持性服务性资源,是农村

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在开放性流动性现代化情境下,乡村内部支持性资源呈现出零散化多元化混合性特征,主要涵盖经济生产型资源、互助志愿型资源与基础服务型资源三大类型。经济生产型资源主要是指农业+副业的农村新产业格局下的多种具备生产性功能的经济组织,比如村集体经济、农业合作社、乡镇工业企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依托乡村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发展,是乡村产业兴旺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为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经济支撑。此外,部分地区探索由乡村内部经济组织拓展社会服务功能,比如合作社养老^④等,直接与社会工作的基本职能相交叉。互助志愿型资源是指基于乡村熟人社会自发形成或孵化培育的,具有互助功能或带有公益性志愿性色彩的乡村内生型组织,并指向多元化的组织目标,比如乡村议事会、乡村老年协会、乡村志愿服务队、乡村幸福院等。基础服务型资源是指主要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所推动建设的具有基本公共服务性质的乡村设施或机构,比如农村敬老院、乡镇卫生院、农家书屋、“残疾人之家”等,以构成乡村社会服务的基本保障。不同农村社区的经济生产资源、互助志愿资源与基础服务资源状况分布不一,从而构成相异的资源组合。多元性复合性零散化的乡村内部资源形态是社会维度的乡土情况的呈现,并构筑起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社会化协作基础。

其三,情感维度的缘情网络。缘情具有情感、情缘、因循人情等含义;缘情网络指向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情感性取向与基层实践的人情关系策略,其涵盖国家层面的情义礼制,人际层面的人情友爱以及家庭层面的关爱情愫等多层要义。传统乡土社会是典型的温情脉脉的“缘情共同体”^⑤,在

①陈晓运:《以党政服务综合体建构乡村振兴的政治支撑——基于德庆县的案例分析》,《岭南学刊》2020年第5期。

②韩鹏云:《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转型与路径优化》,《湖湘论坛》2023年第5期。

③李鹏、张奇林:《村级党政同构:乡村治理有效的组织基础与运行保障》,《学习论坛》2021年第3期。

④李俏、孙泽南:《合作社养老的实践形态与发展路向》,《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⑤易艳阳、周沛:《缘情共同体:农村弱势群体支持中的情感逻辑——基于对两个助残扶贫案例的分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流动性空巢化的新乡土情境中,乡村缘情纽带虽呈现松散化趋向,但“半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仍饱含血缘亲情、邻里乡情、伦理人情等多重缘情要素。基于血缘亲情纽带的家庭是原始本能的情感聚合体。在乡村家庭结构变迁、家庭功能弱化的背景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照料、彼此关爱仍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也是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农村特殊群体的基础性稳定性的支持来源。基于地缘纽带的邻里乡情是乡村社区的典型特质。当代乡村的流动性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乡村的邻里同乡情,但是由共同地域与共同生产生活等所维系的地缘情感仍是农村缘情网络的重要内容。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与社会规范塑造了乡村社会的特定交往网络与人情伦理,并表现为一种朴素的社区归属感与集体共情,对农村个体与家庭行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情感维度的乡村缘情网络是农村社会工作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也是专业社会工作“柔性治理”优势发挥的着力点。

其四,文化维度的乡风民情。乡风民情指向农村基层社区的道德文明与精神风貌,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与内核,涵盖村民素质、家风、乡村文化、村规乡约等范畴,呈现出文化维度的新乡土情境特质。譬如,村民文化素质显著提升,但亦存在着较大的群体分化。部分农村虽实现了“富口袋”却未能解决农民“富脑袋”问题。传统家规家训消解,家庭内部“恩往下流”,家庭资源分配存在重幼轻老倾向,孝文化在一些地区有弱化趋向。流动性使乡村社区凝聚力降低,但落叶归根、回报家乡等传统乡情弥散,部分地区中新乡贤群体崛起。乡村文化建设保留了诸多传统性元素,特定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乡风民俗、乡村风貌、乡村技艺等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弘扬。村规乡约仍是乡村社区文明公约的主要表现形态,但其对于个体的规制力显著减弱。此外,新时代文明实践作为乡风民情建设的重要机制落地实践,在激励乡村志愿服务,引导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中,初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当代农村面临着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碰撞等新情境,从而构成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文化

场域。识别乡村文化特质,提升服务中的文化敏感性,是农村社会工作高效介入的关键点;文明实践、家风建设、民情重塑等乡村文化振兴议题亦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介入要点。

其五,需求维度的美好生活。2020年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农村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推进农村群众的共同富裕,满足其美好生活需求是乡村发展的根本目标。村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内涵是多层次的:从内容来看,主要涵盖经济物质型需求、生活服务型需求以及精神文化型需求等方面;从对象来看,主要指向农村全体人员的普遍性需求与困弱人士的特殊性需求;从范围来看,主要包括个人生活需求、家庭生活需求、社区生活需求、政治生活需求、道德生活需求等多个层面。由此,在农村群体需求升级提档、内容多元的前提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实践目标应不限于补缺型兜底型的传统扶贫济困,也不囿于农村留守儿童、农村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服务,而应根据农村社区的特质、相关人群的需求,以精准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助力农村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特定人群的需求为突破口或介入重点,以社区综合服务的形式回应村民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其幸福感,同时促进农村社区发展,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简单过日子”到“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升级,是当代中国农村乡土性的新呈现,亦从需求维度进一步界定并延展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范畴及层次。

四、多维嵌合: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行动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机遇,拓展了空间,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以上分析,乡土嵌合可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作为乡村基层治理的外源型资源,农村社会工作需从政治、社会、情感、文化、需求等维度嵌入并整合于当代中国农村的乡土新情境,实践多维嵌合的行动路径。

专业化导向的政治嵌合。政治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与农村基层党政系统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在坚持专业性禀赋优势基础上,主动嵌入由

国家力量所主导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构成。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社会工作机构与基层党政组织的良好互动关系,可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必要的政治资源。此外,党政系统所代表的国家力量掌握着大量的财政、设施、场地、人力等公共服务资源,农村社会工作的政治嵌合程度客观上决定了其所能获取的国家资源支持程度。政治嵌合应以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为前提,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基于专业化导向的政治嵌合行动路径具体为:第一,坚持党建引领,心系服务群众。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乡村基层党建,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贯穿乡村治理的基本红线。党建引领农村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沟通党建工作与群众工作,是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初心。此外,有条件的社会工作机构应加强组织内部党建,以引领其政治方向并提升其组织力。第二,融入治理体系,获取行政支持。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下,农村社会工作应充当新型治理主体角色,积极对接基层政府、村委会等行政化主体,共同应对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在解决农村社区问题,满足群众需求的同时,获得行政化主体的物质支持与人力配合。第三,厘清政社边界,维系专业自主。农村社会工作嵌合于乡村基层党建系统,并不意味着政社边界的模糊化。社会工作在积极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同时,应通过多种方式彰显其专业特质,发挥其在公共服务与基层治理中的专业优势,引领其专业化自主性发展轨迹。第四,夯实专业禀赋,生成内源动力。农村社会工作应进一步强化组织建设与队伍建设,夯实其专业性的先天禀赋,以提升服务质量,赢得民众信任,获取政府支持,逐渐生成可持续内源性的发展动力。

协同性导向的资源嵌合。资源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与农村社会内生性资源结构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实践中需敏锐识别农村社区固有的资源,并主动将自身嵌入乡村内生资源体系中,专

业化资源融入本土化资源,促进资源交换与转化^①,与乡村内部支持主体形成整合性协同关系,共同推进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基于协同性导向的资源嵌合路径具体为:第一,调查分析,有效识别。流动性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村内部社会资本,但乡村仍有丰富的资源体系,农村社会工作应以充分的社区调查分析为基础,识别并理顺乡村社区的经济性、互助性、服务性资源现状,为资源连接与整合打下基础。第二,积极公关,平等互动。在检视乡村资源体系基础上,农村社会工作机构可根据乡村内生资源的特点与构成,积极开展对外公关,与乡村本土资源主体沟通对话,达至相互理解与共识形成。第三,优势视角,发掘动员。除乡村固有的显性生产性、互助性、服务性资源以外,社会工作者应基于优势视角,充分发掘与动员潜在资源,传统观念上的被照顾者,比如老年人、残疾人等,也有其长处与优势,可以成为被动员的生产性支持性资源与力量。第四,资源协同,整合推进。农村社会工作在厘清、发掘、激活与动员乡村资源体系基础上,应充分扮演好资源连接者与中介者角色,搭建各资源主体沟通协作的平台,引导乡土资源的有序流动与精准聚合,形成乡村社会资本协同性再生产机制。

柔性化导向的缘情嵌合。缘情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在情感弥散抑或情感凋敝的乡土情境中的柔性化情感型服务策略。当代社会工作虽是专业化技术化的理性治理主体,但社会工作人道主义的助人实践起源,操作层面中的“尊重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同理心”等理念与技术,直接标示其浓厚的情感治理基因与导向。社会工作在应对亲情淡漠与人际疏离,促进社区互动与社会和谐方面有天然专业优势。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应关注由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织就的乡村社区缘情网络,在项目管理、循证实践等专业技术理性基础上,嵌入柔性化的价值与情感,以情相交,以情动人,以情说理,重建村庄社会交往^②。农村社会工

①易艳阳:《社会组织跨界行动策略:实践逻辑、动因效用与风险防范——基于Z助残机构的案例考察》,《新疆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②王进文:《面向村庄的社会交往重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的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24年第3期。

作的柔性化情感化的缘情嵌合实践策略的具体着力点可包括:第一,人情交往,融入乡土缘情。社会工作者初入农村社区需与村民以及社区各类组织建立关系,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比如嘘寒问暖、娱乐互动等是在乡土情境下的迅速破冰,突破陌生隔阂,嵌入乡土,赢得认同与支持的重要方式。第二,亲子辅导,修复家庭亲情。家庭是个体生存发展的直接系统,在家庭人口流动化、家庭结构空巢化的农村,社会工作需高度关注家庭的情感与信念。针对家庭的情感化服务策略,家庭辅导,融洽亲情,促进家庭代际沟通与情感交流,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第三,互动互助,重拾邻里乡情。在半熟人社会的乡村,通过项目设计运作,激活乡村闲散资源,进一步搭建社区邻里互助平台,重构乡村社区邻里情,也应是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重点之一。第四,氛围营造,形塑社区伦理。社区氛围本质上是乡村社区情感弥散化的表现形式。农村社会工作可通过宣传倡导、活动开展等方式,进行价值引导与观念形塑,以营造互助性融合性的良好社区情感氛围,形塑积极型包容型的社区伦理。

敏感性导向的文化嵌合。文化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在新乡土文化情境中的文化体察、文化适应、文化融入以及适度改造。带有城市文化与专业文化色彩的社会工作进入乡村,尤其是民族地区乡村社区时,一方面需以文化敏感性审慎觉察乡村风情与文化形态,以跨越文化震惊与文化识盲,杜绝文化偏见与文化强加;另一方面需基于文化敏感性体察乡村文化对村民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影响,适度进行文化引导,开展文化治理,倡导乡风文明。文化嵌合型社会工作行动路径具体为:第一,尊重接纳,推动向下扎根。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应抛弃专业威权主义思维,排除高高在上的审视性的“他者”心态,以平等尊重的态度来看待乡村传统文化,尊重并理解乡村民俗,扎根嵌入乡土文化。第二,活化遗产,促进文化振兴。协助保护乡村特色民俗文化,挖掘乡村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活化乡村传统文化,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也是农村社会文化嵌合的具体行动方向。第三,交融碰撞,培

育新型样态。农村社会工作可适当引导村民学习并接受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比如互联网文化等,倡导消弭信息屏障,填平数字鸿沟,推进文化共享。鼓励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土的文化交流碰撞中实现文化更新与创新,有效培育新型乡村文化样态。第四,引导弘扬,倡导文明实践。敏锐识别乡村振兴中的障碍性的文化要素,改造不良乡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孝”“守望相助”“助人为乐”等积极成分,引导村民共同制定乡规民约等社区公约并积极践履。构建乡风文明的文化实践场域,孵化有助于农村社会工作成长发展的文化环境。

精准化导向的需求嵌合。需求嵌合指向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输出与农村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农村社会工作的服务供给不应只是比照行政主体的统一标准,也不应只是按政府购买服务的合同操作,而应有效契合于农村服务对象美好生活的具体需求。基于精准化导向的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可分解为:第一,精准识别,厘清重点。扶弱助困仍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使命,以精准调研为基础,从数量、类型、年龄、家庭、收入等指标精准识别出失能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乡村社区特殊群体的基本状况,厘清乡村社会工作重点服务对象的需求及其轻重缓急程度,以保障“弱有所扶”的兜底性目标。第二,精准设计,应对难点。在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情境下,除“一老一小一残”等特殊人群重点对象以外,农村社会工作还应着眼于农村普通百姓的幸福生活诉求。社会工作扮演“赋能者”角色,促进村民的需求表达与共同行动,直面乡村基层服务供给中的痛点与难点,将村民的诉求精准凝练设计为具体的服务项目来推进。第三,精准递送,切中要点。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具体实施中,社会工作者需精准连接乡村各类内生性与外源性资源,根据重点对象、普通居民、社区建设等不同层次的需求,引导资源的精准递送,使得各类服务资源切中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以实现有的放矢与精准投放。第四,精准评估,推广亮点。优化农村社会工作评估体系,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以服务效果、服务效率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基本评估依据。此外,

精准凝练实践亮点与基本经验并加以宣传推广,以提升农村社会工作的专业获得感与社会认同度。

五、结论与讨论

农村社会工作是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是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力量。城市化、现代化、理性化导向的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地区的本土实践,要摒除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以及专业威权主义姿态,关注、识别、嵌入并融合当代中国乡村实践场域的新乡土情境,探索乡土嵌合的本土化实践框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治维度的党政系统,社会维度的资源结构,情感维度的缘情网络,文化维度的乡风民情以及需求维度的美好生活构成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实践面向。由是,需以专业性、协同性、柔性化、敏感性与精准化为实践导向,探索政治嵌合、资源嵌合、缘情嵌合、文化嵌合、需求嵌合的多维乡土嵌合行动路径,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扎根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乡土嵌合实质上是对农村社

会工作实践导向的总结提炼,以期指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基本型通用型实践逻辑框架。乡土嵌合框架涉及政治、社会、文化、情感等多重内容维度,涵盖农村各类群体等多元服务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工作全能主义或无所不包的行动导向。农村社会工作者在掌握基本的通用型实践理论与实务技巧,能自如应对农村社区的共性化基础性问题的前提下,需对不同农村的发展差距、资源差别、文化差异等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能够敏锐识别不同乡村社区的乡土情境的特色化呈现,同时结合相应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业务类型以及宗旨使命,有选择性有侧重地提供个性化服务,开展弹性化与适应性的专业实践。在乡土嵌合框架下,农村社会工作的行动重点、实践方式以及具体服务则是个别化特殊性差异化的,这也是社会工作嵌合型发展的基本要义。

责任编辑 杨 幸